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The Transcripts of
Leo Strauss's Courses

刘小枫◎主编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讲疏


古典政治哲学引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1965年）

Leo Strauss's Course:
Aristotle, offered in 1965

扎科特 (Catherine Zuckert)◎整理

姜林◎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刘小枫 ● 主编



古典政治哲学引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1965年）

Leo Strauss's Course:

Aristotle, offered in 1965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讲疏

扎科特 (Catherine Zuckert) ● 整理

姜林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政治哲学引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 1965年/(美)列奥·施特劳斯讲疏; (美)扎科特整理; 姜林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675-8107-4

I. ①古… II. ①列… ②扎… ③姜… III. ①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02.233 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564号



Leo Strauss's Course: Aristotle, offered in 1965

By Leo Strauss, Catherine Zuckert. ed.

Copyright © by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ALL RIGHTS RESERVED.

施特劳斯讲学录

古典政治哲学引论

讲疏者 (美)施特劳斯

整理者 (美)扎科特

译者 姜林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960 1/16

插页 6

印张 15.25

字数 175千字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0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8107-4/D.222

定价 6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1949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自1956年起至去世(1973),施特劳斯授课大多有录音。施特劳斯去世后,部分录音记录稿一直在施特劳斯的同学们手中私下流传,并经学生之手进一步流传,其实际影响断难估量。本世纪初,部分记录稿的影印件也流传到我国年轻学子当中。这些打印的录音记录稿文字多有舛误,有些地方因油墨模糊字迹难辩,还有不少明显脱漏。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施特劳斯的养女珍妮教授(Professor Jenny Strauss)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主任塔科夫教授(Professor Nathan Tarcov)决定整理施特劳斯的全部讲课记录稿,并在“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陆续刊布,供天下学人分享。2013年,本工作坊计划将陆续刊布的整理成果译成中文,珍妮教授和塔科夫教授得知此计划后,全权委托本工作坊主持施特劳斯讲课记录整理稿的中译,并负责管理中译版权。

本工作坊按“施特劳斯中心”陆续刊布的整理本组织逐译(页码用方括号标出),翻译进度取决于整理计划的进度。原整理稿均以课程名称为题,中文稿出版时,为了使用方便,我们拟了简要的书名,并在副标题位置标明课程名称。

刘小枫

2016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首席编者 塔科夫(Nathan Tarcov)

执行编者 麦基恩(Gayle McKeen)

李向利 译

施特劳斯不仅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还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老师。在他的这些课程讲学录中,我们能看到施特劳斯对众多文本的疏解(其中很多文本他写作时很少或根本没提到过),以及对学生提问和异议的大段回应。在数量上,这些讲学录是施特劳斯已出版著作的两倍还多。对研究和修习施特劳斯著作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们将极大地增添可供参阅的材料。

1950年代早期,由学生记录的施特劳斯课程笔记的油印打字稿,就已经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中间传阅。1954年冬,与施特劳斯的[关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课程相关的首份录音资料,被转录成文字稿分发给学生们。斯多灵(Herbert J. Storing)教授从瑞尔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找到资助,以支持录音和文字稿转录,从1956年冬施特劳斯开设的历史主义与现代相对主义(Historicism and Modern Relativism)课程开始,该资助成为固定的[资金]基础。自1958年起至1968年离开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在这里开设的39个课程中,被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的有34个。从芝大退休后,1968年春季、1969年秋季和[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施特劳斯在克莱蒙特男子学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授课,有录音(尽管他在那里的最后两次课的磁带已佚),他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四年的课程也有录音,直至他于1973年10月去世。

现存原始录音的质量和完整性差别很大。施特劳斯[讲课]离开麦克风时,声音会弱得听不到;麦克风有时也难以捕捉到学生们提问的声音,却常常录下门窗开关声、翻书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声。更换磁带时录音中断,[记录稿]就留下众多空白。施特劳斯讲课超过两个小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磁带就用完了。录音磁带转录成文字稿后,磁带有时被再次利用,导致声音记录非常不完整。时间久了,磁带[音质]还会受损。1990年代后期,首先是格里高利(Stephen Gregory)先生,然后是芝大的奥林中心(John M. Olin Center,由John M. Olin Foundation设立,负责调查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管理人,发起重新录制工作,即对原始磁带数码化,由Craig Harding of September Media 承制,以确保录音的保存,提高可听度,使之最终能够公布。重新录制工作由奥林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并先后由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和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负责监管。格里高利先生是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管理人,他在米勒中心(Jack Miller Center)的资助下继续推进这项规划,并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保存和访问处(Division of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拨款帮助下,于2011年完成了这项规划,此时他是芝大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管理人。这些音频文件可从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获得:<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

施特劳斯允许进一步整理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不过,他没有审核这些讲学录,也没有参与这项规划。因此,施特劳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罗波西最初把[讲学稿]版权置于自己名下。不过,在2008年,他把版权转为施特劳斯的遗产。从1958年起,每份讲学录都加了这样的题头说明(headnote):

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是对最初的口头材料的书面记录,大部分内容是在课堂上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部分有意准备出版。只有感兴趣的少数人得到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意味着不要利用它,利

用就与这份材料私下的、部分地非正式的来源相抵触。郑重恳请收到它的人,不要试图传播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未经讲学人核实、审阅或过目。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他的女儿珍妮(Jenny Strauss)——请塔科夫(Nathan Tarcov)接替克罗波西[承担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的工作。此时,塔科夫是芝大奥林中心以及后来的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克罗波西直到去世,已经作为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忠诚服务了35年。珍妮和塔科夫一致认为,鉴于旧的、常常不准确且不完整的讲学录已经大范围流传,以及[人们]对施特劳斯思想和教海的兴趣持续不减,公开[这些讲学录],对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来说,会是一种帮助。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鼓励:施特劳斯本人曾与班塔曼出版社(Bantam Books)签订过一份合同,准备出版这些讲学录中的四种,尽管最终一个都没出版。

成立于2008年的芝大施特劳斯中心发起了一项规划:以已经重新录制的录音材料为基础订正旧的文字记录稿;转录尚未转录成文字稿的录音材料;为了可读性,注释且编辑所有的记录稿,包括那些没有留存录音材料的[记录稿]。这项规划由施特劳斯中心主任塔科夫任主席,由克罗波西负责管理,得到来自维尼亚尔斯基家族基金会(Winiarski Family Foundation)、希夫林夫妇(Mr. Richard S. Shiffrin and Mrs. Barbara Z. Schiffrin)、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和赫特格基金会(Hertog Foundation)拨款的支持,以及大量其他捐赠者的捐助。筹措资金期间,施特劳斯中心得到芝大社会科学部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职员伯廷赫布斯特(Nina Botting-Herbst)和麦卡斯克(Patrick McCusker)大力协助。基于重新录制的磁带[修订]的这些记录稿,远比原有的记录稿精确和完整——例如,新的霍布斯(Hobbes)讲学录,篇幅是旧记录稿的两倍。熟悉施特劳斯著作及其所教文本的资深学者们被委任为编者,基础工作则大多由作为编辑助理的学生们完成。

编辑这些讲学录的目标,在于尽可能保存施特劳斯的原话,同时使讲学录更易于阅读。施特劳斯身为老师的影响(及其魅力),有时会显露在其话语的非正式特点中。我们保留了在学术性文章(prose)中可能不恰当的句子片段;拆分了一些冗长、含糊的句子;删除了一些重复的从句或词语。破坏语法或思路的从句,会被移到句子或段落的其他部分。极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重新排列某个段落中的一些句子。对于没有录音资料流传的记录稿,我们会努力订正可能的错误转录。所有这些类型的改动都会被注明。(不过,根据重新录制的录音资料对旧记录稿做的改动,没有注明。)我们在尾注中注明改动和删除的内容(不同的拼写、斜体字、标点符号、大写和分段),尾注号附在变动或删除内容前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上。文本中的括号显示的是插入的内容。缺乏录音资料的记录稿中的省略号仍然保留,因为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是删除了施特劳斯说的某些话,还是他的声音减弱[听不清],抑或起破折号作用。录音资料中有听不见的话语时,我们在记录稿中加入省略号。[记录稿中]相关的管理细节,例如有关论文或研讨班的话题或上课的教室、时间等,一律删除且不加注,不过我们保留了[施特劳斯基布置的]阅读任务。所有段落中的引文都得到补充,读者能够方便地结合[引述的所讲]文本[的内容]阅读讲学录。施特劳斯提及的人物、文本和事件,则通过脚注进行了确认。

读者应该谅解这些讲学录的口语特点。文中有很多随口说出的短语、口误、重复和可能的错误转录。无论这些讲学录多么具有启发性,我们都不能认为它们可以与施特劳斯本人为出版而写的那些著作等量齐观。

2014年8月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中译本说明(姜林)/

编订者引言: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引论(扎科特)/

编订者说明/33

第十讲 古典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35

第十一讲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至卷三/58

第十二讲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三/87

第十三讲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三/114

第十四讲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七和卷四/142

第十五讲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四、卷五和卷六/171

第十六讲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和卷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198

中译本说明

姜 林

施特劳斯以其政治哲学研究闻名,所誉所谤皆系于此。习惯上,他的政治哲学有两种说法,或谓“古典政治哲学”,或谓“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二者似乎相同,阿奎那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当然属于古典政治哲学的范畴,但我们终究不能说它们是“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关于前者,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有一个近乎定义的说法,古典政治哲人所持有的自然正当说,是“由苏格拉底始创,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廊下派和基督教思想家(尤其是阿奎那)所发展的那种特定的自然正当论”。^①

古典政治哲学之为古典,关键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持有某种接近的自然正当论。基于这种自然正当,古典政治哲学才能以关于最佳政制的认识对现实政治进行判断和引导,也就是说,政治事务的真正标准是绝对的、自然的善的秩序。古典政治哲人这么做,首先是因为古典政治哲学与政治息息相关,而非客观的、中立的知识或者哲学,其次,古典政治哲学的引导并不是哲学教育,而是在政治体中推荐符合善的秩序的美德教育。

但是,既然称之为“哲学”,它就必然探究“什么是”的问题,而“什么是美德”这样的问题,必将最终指向超越政治的哲人生活。如

^①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页121。

何在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的张力中维持政治的德性并延续哲学,就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关键。^①而柏拉图则是理解这一点最为深邃的哲人,因此“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典范。

可是,在建议如何着手进入古典政治哲学时,施特劳斯却又常常建议我们,不妨以亚里士多德作为开始——而不是以他的典范柏拉图开始。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授课经历似乎也符合这个矛盾的情形。

1950年代,施特劳斯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前十年里,授课文本除了尼采等现代哲人,古典文本几乎只讲授柏拉图,似乎这个典范引导着他对早期学生的教育。但到了1960年代,施特劳斯授课内容中亚里士多德的分量突然猛增。^②依旧令我们甚感意外的是,他虽然以各种方式谈到亚里士多德,但在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者论著中,除了《城邦与人》第一章,几乎没有任何一篇论文和论著以亚里士多德或其作品为主题。就施特劳斯的作品而言,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不但难以匹敌柏拉图,跟色诺芬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施特劳斯的授课目录里,在他的讲座劝诫里,亚里士多德似乎又具有某种柏拉图和色诺芬所不具备的特质。

施特劳斯本人曾就此给出一个简明的说法:

我们时代的危机溯源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摆脱困扰我们的智识难题的方法,就是返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③

施特劳斯的意思不难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终结了古典政治哲学塑造的古典世界,这是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既然知道病根自然就需要根治,施特劳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最初的药方——1960

① 《论古典政治哲学》,收入《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又收于潘戈主编,《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② 参叶然编,《施特劳斯年谱》和《施特劳斯文献分类编年》,收于《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主题论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③ 《政治哲学的危机》,李永晶译,收于刘小枫主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页351。

年,施特劳斯第一次讲授亚里士多德,内容就是《政治学》。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可以成为现代读者进入古典政治哲学的入门,以疗救现代之病?在笔者现在翻译的这部《政治学》讲课稿里,施特劳斯断然拒绝了柏拉图,并给出了一个基于文学形态的表面理由:

为了理解古典政治哲学,或者为了正确地研究古典政治哲学,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研究始于何处。我的答案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是始于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的著作都是对话作品——尤其《王制》,当然其他作品也是,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是论述文体(treatise)。(第十讲)

对话作为一种文体,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存在形态,但这恰恰不可以作为开始,作为开始的反而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体裁作品《政治学》。为什么?因为柏拉图对话导致一个难题:我们难以判断什么是柏拉图真正的看法,或者说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才能切入柏拉图的看法。这似乎意味着从亚里士多德入手省却了这样的麻烦——但或许也减低了某种智识难度。难道论述文体就意味着更加直接简单的理解吗?恐怕也未必。我们不妨从施特劳斯这里的理由略作推论。

为什么论文体特别适合现代的读者?施特劳斯在解读马基雅维利时常常说,让我们回到事物的表面。这其实是苏格拉底时常采用的方法,从交谈双方的某种共识重新开始。这意味着论文是现代读者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某种难得的共识。“论文”成为一种思想的载体——而不是诗歌、戏剧或者对话——既是一个古代现象,也是一个现代现象。论述文体,或者散文体在古希腊是一个后起的文学现象,早期哲人(帕默尼德、克塞诺芬尼等)都使用诗歌,而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散文成为哲学的常见载体,亚里士多德是其高峰。^①但即便如

^① 参 C. Osborne, “Was Verse the Default Form for Presocratic Philosophy?” In C. Atherton ed. *Form and Content in Didactic Poetry*, Bari: Levante Editori, 1997, 页 23-35。

此,诗歌或者对话并未被排除在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体裁之外。

可是,发端于1930年代的“新政治科学”是以逻辑形式作为表达的基本要求,这就必然意味着论文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哲学表达形式。^①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现代的政治哲学读者来说,首先不存在阅读上的敌意。而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最重要的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对比现代政治哲学。这是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的危机》和《古今自由主义》中的《跋语》这两篇文章中所作的重要事情:比如,《跋语》一文对二者作了五种丰富的对比。正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眼光,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开始呈现,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徐徐敞露。

除了论文这种表达方式,在讲课过程中,施特劳斯似乎于无意当中提到,亚里士多德还与现代政治哲学共享一个类似的主张。在讨论卷四1288b10-1289a5处,施特劳斯说:

亚里士多德这里的主张是,如果政治科学是研究诸种政制,那么,他就是这种科学的奠基人……因为在他之前的人或者只关注最佳政制,比如柏拉图,或者倾心于某个具体政制,比如斯巴达政制,并盛赞斯巴达人。但是,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的进路包括一切政制——至少原则上如此;没有任何人如此尝试——至少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人。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观念与当下流行的政治科学观念是一致的。必然不会遗漏任何一种政治或者社会组织;有些可能极其重要,但在原则上,它们都在政治科学的视域之内。

施特劳斯说,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研究方法同现代政治哲学(科学)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不仅仅关注最佳政制,他还有科学研究的热情和严肃,甚至持有某种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必须研究所有可能的政制。

^①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页209-211。

当然,在前面提到的《跋语》中,施特劳斯首先强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是一回事,而现代政治哲学则日渐衰退为政治科学。但我们多少会有一些疑问: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政治哲学在这两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共识”,是不是意味着,他要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产生担负某些责任呢?

再回到作为开端的亚里士多德,这个开端为什么是《政治学》,而不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不是《修辞学》,甚至不是更加具有哲学论文性质的《论灵魂》呢?施特劳斯似乎没有提到这一点,或许因为他认为这一点不言自明:

《政治学》的确切主题用希腊语来说是 *politeia*,这是一个从城邦派生出来的字眼。这个词通常被译成英文的“宪法”(constitution)。不过这多少让人误解……我们通常指大地之法、大地之根本大法。(《政治哲学的危机》,前揭,页 359)

《政治哲学的危机》中的这段话表明,《政治学》的主题是政制。施特劳斯在这次讲稿中屡次表明,《政治学》正是以政制作为思考的核心。这尤其关系到施特劳斯对《政治学》第三卷和全书的解读:

politeia 的问题,各种不同的政制,而不是作为城邦的城邦,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的主题。要点如下。政治的问题不在于城邦。从政治角度来说,人们不会关注,他们是否应该生活在政治社会里,是否拥有政府,他们关注的是,生活在什么类型的社会里,拥有什么类型的政府。(英文版,页 36)

这一点恰恰是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科学之后不再熟悉的问题,或者故意遗忘的问题。

关于施特劳斯本次《政治学》课程的讲课过程,以及讲课稿的主要

内容,编者扎科特在其导言中已有详细说明,译者不再画蛇添足,而只就施特劳斯何以视亚里士多德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入门略呈己意,就教于方家。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译文,施特劳斯的课程以巴克译本为课堂读本,但他在阅读文本时,常常根据己意,更改甚至完全不采用巴克译文,扎科特为了便于读者核对,增加了详细的注释——虽然在译者看来,有些注释过于琐碎,但有心的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思考的痕迹,故予以保留。

2018年6月2日于北京